

以上表明，说同高岗、饶漱石的斗争是一次路线斗争，是不正确的；说他们是适应了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的愿望，其目的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实际上已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也不符合事实。高岗、饶漱石急于在当时进行篡夺权力的阴谋活动，显然是由于党在由建设新民主主义转向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战略转轨过程中，党中央主要领导人之间在认识上和工作中出现了分歧，这些不同意见并没有在中央上层经过讨论统一认识，而是由中央主席个人裁决，肯定一种意见，否定和批评另一种意见。这种党内生活方式，就使有个人权欲的野心家感到有隙可趁。弄清高岗的“经济内阁”这个历史情节，对我们吸取党内生活方面的历史经验，将会是有所裨益的。

〔注〕

- ①中央书记处分工刘少奇主管全国总工会的工作。
- ②《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88年第4期第6页。
- ③中共中央东北局《党的工作》第120期。
- ④《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第13页。
- ⑤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
- 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

忆八路军第120师的后勤工作

范子瑜

第120师后勤机构的发展沿革

抗日战争的帷幕拉开以后，1937年8月下旬，红2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一部、红军总部直属队各一部，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0师。师设司令部、政训处、供给处、卫生处。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10月改为政治部）主任关向应、副主任甘泗淇；供给处长陈希云、副处长赵镛；卫生处长侯友诚（未到职），刘运生代处长，后曾育生任处长。师辖第358旅、359旅、教导团和5个直属营，全师1.4万人。

第120师后勤机构的设置是：师设供给处，处下设科。会计科科长范子瑜，出纳科科长周则盛，粮秣科科长史可全、何家柱，军实科科长谭凯丰、孟子厚，军械科科长余在海、谭凯丰。

旅设供给处，并设有相应的科。第358旅供给处长史可全、黎化南；第359旅供给处长何维忠。

团和教导团设供给处，并设相应的股。营设供给员。连设司务长。

1937年9月2日，第120师部队在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次日，贺龙等率师部、第358旅、359旅一部及教导团共8200人，由驻地出发，经韩城芝川镇，东渡黄河，开赴晋西北抗日前线。余部编入陕甘宁留守部队。

1938年1月，部队由出师时的2旅3团8200人，发展到2旅6团2.5万人。5月，供给部副部长赵镕随肖克到平西挺进军区任供给部长。

第120师部队进入冀中后，师部率第716团等主力部队同冀中军区领导机关一起，执行主要作战任务。同时，派出支队与冀中部队配合，开展游击战争。1939年2月，组成张（宗逊）纵队，统一指挥独立第1旅、第2旅。1939年2月，我被调到独立第1旅任供给部长。1939年11月，调回第120师供给部任副部长。供给部长仍是陈希云，周则盛任政委。

1940年夏，部队整编，第120师成立后勤部。后勤部下设供给部、卫生部。后勤部长兼政委陈希云，副部长刘忠、范子瑜兼供给部长，供给部副部长谭凯丰、谷佑箴，卫生部长曾育生（后为贺彪），政委刘运生（后为杨云阶、戴文彬），副部长张汝光、周长庚。

1940年11月7日，晋西北军区成立，领导机关由第120师兼。各旅或纵队兼军分区机关，共有9个军分区。

1942年9月，晋西北军区改为晋绥军区。后勤部班子未变。1943年，后勤部组建了晋绥军区工业部，首任部长王逢源，继之蒋崇景，政委谷佑箴，副部长杨开林。

1945年7月，在晋绥军区成立吕梁、雁门、绥蒙3个二级军区和1个直属分区的同时，为组织绥远战役，成立了晋绥野战军。野战军由第1、2、3、4、5旅组成。司令员贺龙，政委李井泉，参谋长张经武，后为陈漫远，政治部主任甘泗淇。野战军后勤部由晋绥军区后勤部兼。旅设后勤部，下设供给部、卫生部。

第120师的供给工作

1936年西安事变后，红2方面军的部队进驻西安附近的泾阳县的云阳镇、曲孜镇，同官县的陈炉镇，富平县的庄里镇一带。在庄里镇部队住的时间最长。

在庄里镇，部队吃的粮食是军委供给部统一供给的，不足的部分，由我们自己买。当地供给部队的都是白面。部队南方人多，不会赶面、蒸馍，就把面用水搅一搅做“疙瘩头”吃。红军多是湘鄂一带的人，为了照顾他们的生活习惯，我们还从湖北买来一些大米。

1937年5月，军委供给部发给我们每人1套灰衣服，我们自己做了1套，另外还发了2件衬衣、2条裤衩。枪支是旧的，没有新的补充。第120师到了太原。通过军委供给部在太原设的办事处，在国民党第二战区阎锡山处领了一些轻机枪和弹药。每人补充了1套棉衣，1床军毯。另外，八路军供给部给每人还搞了1个斗笠，热天遮太阳，雨天挡雨。老百姓把斗笠看作是八路军的标志。红军时期我们习惯了穿草鞋，从庄里镇出征也还是穿草鞋。到了太原，每人发了1双鼻子鞋，穿起来感到不如草鞋舒服。从太原、宁武下车后去晋西北开辟根据地。

晋西北地区有十几个县，群众生活相当困难，部队的供给工作亦相当困难。在1939年以前，供给工作主要靠军饷买粮。到1940年，国民党就不发军饷了。那时领到的钱，前方部队第115、120、129几个师只留一半，另一半给了延安党中央。那时，八路军还抽调了一部分干部参加“牺盟会”的组织领导。120师派罗贵波、张平化去晋西北专区的“牺盟会”，我也调去任物资分配部部长。当时，阎锡山提出了一个口号，叫“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合理负担”。我们就利用这个口号，扩军、募捐，动员人力、物力、财力，给部队分配。由于晋西北地方太穷，人口稀少，兵员扩充困难，扩充多了也养不起。抗日战争前两年，部队战士大都还是老红军。到六届六中全会以后，部队开赴冀中才开始扩大，随之老红军当战士的基本

上没有了。

当时解决粮食和副食问题有三个渠道：一是靠生产自救，二是靠政府就地筹措，名义叫“抗日救国公粮”，这是主要的。三是靠缴获敌人的。1940年120师部队从晋察冀返回晋西北。晋西事变以后，阎锡山的口号是：“困死八路军、饿死八路军、赶走八路军”，停止发给我军应得的抗日经费和作战物资，再加上日寇推行“三光”政策，使我根据地军民的物质生活处于极端困难的阶段。部队的粮食定量是一斤半，实际上吃不到一斤半。有的只有用黑豆磨面糊糊喝，连菜也是黑豆做的，如豆芽、豆腐，油水很少。那时人的面目，二三十岁的人看上去象四、五十岁。

在此情况下，晋西区党委、行署和军区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发展生产、自力更生”和“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方针，发动部队广泛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养猪、种菜、搞副业，每个饮食单位都要这样做。到1941年底这一年，军区部队总共开荒9.2万余亩，种菜1300余亩，养猪4000头，牛羊2000头，鸡1500只。除农业生产外，还开煤、铁矿共23处，铁工厂14个，制药厂5个。为了改善部队生活，还开设了30个油坊，35个粉坊，5个磨坊，19个豆腐坊，35个盐厂。

1940年120师部队还组织一部分人到清（徐）、太（原）、文（水）、汾（阳）平川去背麦子改善生活，深入敌后解决吃饭问题。背麦子没有口袋，就用自己的裤子把裤腿一捆，装上麦子背回来，一次背40多斤，路上吃一半，剩下的背到后方兴县的蔡家崖。这些麦子大都送到后方医院，机关和部队很少吃得到。这对伤员恢复健康起了很大作用。

1940年秋天，贺龙要供给部部长陈希云和我分别带领部分人员到敌后搞“公粮变款”。陈希云到文（水）汾（阳）平川，我到忻（县）崞（县）平川，都是敌占区。何谓“公粮变款”？就是让老百姓把应交的公粮折合成钱，由我们收起来，到敌占区买东西。陈希云带去了三四十个人，我带了20多个人，化妆成老百姓进行活动。经过几个月的筹措，搞到了一部分钱，也买了一部分东西。1940年冬，还向贺龙汇报了一次。此后，我即随骑兵部队深入大青山敌后筹款。

大青山根据地是晋察冀边区的屏障，通向蒙苏的要道，陕甘宁边区的北大门。当时，我们主要搞鸦片烟土（又称“特货”，是黑色的）。那个地区出产这个东西，搞到后运到陕西省的跃州、同官一带的马栏镇、张村驿去，卖给那里的商人，1两鸦片能卖10块银元。3年中我们一共运了3次，第一次就运了1.5万两，卖了15万块银元。部队基本靠这个东西来解决困难。

1941年5月我们运鸦片回来，得知延安党中央经济相当困难。中央以军委（含八路军总部）参谋长叶剑英和军委后勤部部长叶季壮的名义，给贺龙、关向应发了个电报，提出拿多少TNT（炸药）换我们的“特货”。贺龙把我和陈希云找了去，贺龙把电报拿给我们看，关向应、周士第、甘泗淇也在场，问我们怎么办？我当时年轻，想问题简单一些，就先表态说贺老总您决定就是了。贺老总问我们一共搞了多少东西回来，我说大概有1.5万多两货。贺老总说：“那就拿1万两吧！”其他几位首长都说贺老总你定就是了。贺老总让周士第给延安发电报，说我们马上就把东西送到延安去，没有提向延安要什么。这也说明，贺老总顾全大局，对党中央无限忠诚。

第120师的农副业生产和生产消费合作社

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从1937年2、3月开始，部队即着手搞农副业生产。办法就是租老百姓的地或自己开荒。除种粮种菜外，还养猪、养鸡、养羊、磨豆腐、生豆芽等，一个饮食单位起码养4头猪。部队人多，肥料充足，种的菜长得很好。春天时部队反映不够吃，到9月份部队出征东渡黄河时，才知道生产的粮、菜、肉吃不完，都交给了军委总供给部。

部队开到晋西北后，在战斗间隙开展了大规模的以农业为主的生产运动，搞得最好的是359旅。359旅于1940年底至1942年春陆续奉命开赴临县、金盆湾、南泥湾、九龙泉等地区。朱总司令指示该旅在时刻保持战斗准备的情况下，除完成每年的练兵任务外，以南泥湾为中心，坚决实行屯田政策，开展生产运动。

南泥湾地区，多年荒芜，人烟稀少，乱木杂草遍野，山禽野兽成群。部队开到南泥湾地区时，生活条件 and 生产条件都非常困难。

由于全旅上下一致的艰苦努力，辛勤劳动，逐步实现了自给，1941年该旅开荒种地11200亩，收细粮1200石，达到了粮食自给7.6%，经费自给（包括衣服、油、盐、杂支、津贴、学习等项）78.5%。1942年，种地26800亩，收细粮3050石，粮食自给达到80%，经费自给达到了90.2%。1943，该旅养猪4200多头，牛820多头，羊7800只，达到了王震旅长所提出的“2人1猪、1人1羊、10人1牛”的计划。

独立第1旅驻防绥德、米脂地区，自1942年开始因地制宜发展工业。他们除了种菜、养猪和种了少量粮食外，全旅指战员在旅领导提出的“人人生产、个个劳动，争取自给自足”的口号下，做到了人手一车（纺线）。1943生产收益已能自给64%，到1944年则达到了基本自给。358旅于1944年在郃县以西葫芦河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运动。当年即开荒种地14万亩，收粮1万零400石，收菜270多万斤，达到了基本自给。1945年又增开生荒7万亩，播种面积达21万亩。7月，部队奉命开赴晋绥，庄稼移交给兄弟部队。

大生产运动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它和伟大的整风运动结合在一起，为我们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思想上和物质上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此外，120师各部队还办起了生产消费合作社。一是搞点收入改善部队的的生活；二是平抑物价。合作社一般都是以师、旅、团为单位办，数军区的最大，有数十人，杀猪卖肉还要从部队抽人。部队在富平县庄里镇时就办了消费合作社，从1937年的春天开始，一直搞到这一年的8月底。我那时被抽出来负责合作社的工作。合作社的同志化妆成学生，到西安和西安附近的三元县、渭南等比较繁华的商业城市买东西，运到部队合作社去卖。

抗战开始后，部队住到哪个地方，就在哪个地方办消费合作社。1940年以后，就办起了这个字号那个字号的公司，比生产消费合作社的场面大多了。仅晋绥军区本身，就办起了同济（兴县）、同德（绥德）、同和（神府）3个字号的公司。在延安办了南昌公司。各个二级军区和军分区以及团以上野战部队，都办了商店。为部队生活提供了方便条件，为解决部队的困难出了力，为平抑物价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第120师暨晋绥军区的军工生产

军工生产，是部队后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光荣的历史。抗日战争后，军工生产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特点是，部队有了自己比较稳固的后方基地。1937年9月，120师深入

敌后抗日，由于战争频繁，随军修械工人满足不了战争的需要，又在晋西北招收了50多个工人。由于他们对我党的政策比较了解，故主动派人与我军接洽，带着一部万能铣床从太原兵工厂逃出来。这些工人有刘希敏、温鼎成、郝继堂等。于是在岚县的一座大庙里成立了修械所。所长杨开林。有60多名工人，七八台机器，主要任务是修理枪炮。

1938年8月，120师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带领部队进入冀中平原作战，从岚县修械所挑选了杨开林等10来个工人，随师部到冀中。358旅仍在岚县，所以，岚县修械所继续存在。由于冀中战斗频繁，难以开展修械工作，因之，将修械科转到120师的后方平山地区的西石门刘家沟。因前方损坏的枪支多，修械任务重，又从冀中军区调了10多个工人组成修械所。

师部返回晋西北后，第358旅的修械工人全部交给师部。在陕甘宁边区葭县倬牛沟建立了修械所，归120师统一领导。所长杨开林，有200多名工人，30多部机器，成了一个规模空前的兵工厂。

兵工厂为了增加产品，提高质量，先后开展了立功运动和技术革新运动。大力提倡发明创造，进行工具改革。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产量增加了1倍，质量显著提高。

从1940年到1942年，倬牛沟修械所除负责前方损坏枪炮的全部修理任务外，还于1940年为庆祝贺龙师长46岁寿辰，发动群众制造46式步枪；于1941年到1942年制造了50、60掷弹筒；仿效国民党中正式步枪，制造步枪200多支；1942年，承担了手榴弹的任务。这时共有修械工人1400多名，修械所正式改名为兵工厂。兵工厂下设修械所1个，在倬牛沟；炸弹厂2个，一个在蟋蟀峪，一个在木头峪；负责生产炸弹、地雷、50炮和复装子弹。

1943年，是军工生产大发展的一年。这一年组织了晋绥军区工业部。在倬牛沟附近建立了化学厂、皮革厂。在山西临县招贤镇建立了铁工厂，组织了矿务局。当时军区工业部投资1万元，修建厂房和一部分工人宿舍。另外，还通过其它渠道筹集生产枪炮弹药的原料，使之源源不断。如把破袭铁路的铁轨抬到工厂做枪炮；在太原、文水、保德、离石、交城、汾阳、徐沟、清源（今清徐）等地，发动群众土法造硝，建立造硝基地。在保德、临县、岚县、倬牛沟等地，通过当地政府动员，将当地制做马掌的师傅和农民铁匠组织起来，参加兵工生产，成了兵工厂的重要组成部分。

延安工业局派遣一部分技术人员支援晋西北，对提高产品质量起了重大作用。第一批生产的掷弹筒叫120式，现在叫40火箭筒，装备了大青山骑兵支队。开始是日本鬼子做的，我们缴获后进行仿造。工程师温承鼎和吴奎龙（从延安来的）来后，研究制成了第二批鼎龙式掷弹筒，生产的数量可以装备到晋绥军区大部分营连部队。根据部队需要和合理配置的原则，每连装备3至5门、8至9门不等，有个别班也装备1门。各二级军区也都有自己的炸弹厂和修械所。1947年国民党进攻陕甘宁，兵工厂迁移到河东临县进行生产。

军工生产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被服生产。1937年120师在陕西就开始组织被服厂。以后，被服厂从岚县搬到兴县、神府县的王桑塔。在那里组织了被服1厂、2厂。后又搬到王家沟，一部分搬到兴县的车家庄；由原来的几个人、二十几个人扩大到几百人；由1厂扩大为3个厂，归晋绥军区后勤部军需科领导。此外，还组织有纺织厂（后改为染织厂）、毛织厂、制药厂。制药厂主要是制中药丸，自己采制中药。开始什么药也没有，烧木炭灰，吃木炭灰治腹泻；再就是从敌占区买点西药。

服装原料主要靠我们自己组织人到敌占区去买。其次是组织敌占区的商人，通过各种渠

道来买。1937年冬天到1938年这段时间，换装部队扩大了一些，新扩大的部队没有棉衣。为解决服装原料问题，关向应政委带着宣传部长张平化、军实科长孟子厚和我，到山西临县做工作。通过做县商会会长冯锡藩的工作，把临县商人的布都买了下来。然后发动临县的缝衣铺子来做，解决了部队的冬装。1938年冬天120师开赴冀中后，也是靠买。我们专门同当地老百姓联系，产的布有多少要多少。当地有两种布，一种是土布，一种是宽面布。买来后，再用染料染色。开始染成灰色，1940年后改染黄色。为什么把染色改染黄色呢？主要是在敌占区买不出硫化青，没办法染。120师有学过化工的大学生，他们有办法能从槐树籽等植物中提取黄色染料，故以后120师部队的衣服便改为黄色。1940年以后，通过地方政府发动群众有组织有计划地生产布匹，定名叫“标准布”。何谓“标准布”？就是生产的一匹布不多不少正好做一套衣服。部队的被服虽经多方努力，穿的仍较困难，只能由供给部门按照前方、后方、环境、季节等轻重缓急情况逐步进行发放。

到1942年秋，晋绥地区有3个大军区被服厂和两个二级军区被服厂，但解决穿衣问题的力量仍然不够。解决的办法就是由被服厂把衣服坯子裁剪好，发给驻地群众铺棉絮、羊毛，由群众把衣服做起来。军鞋也基本上是靠群众做。各个县区政府和妇救会，分派区村的妇救会动员老百姓去做。

抗战期间，120师部队遇到的困难较大，但经过军民一致努力，困难低了头。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是晋绥这个地区的老百姓养活了这支部队。这支部队从抗战出征的几千人发展到10万多人，老百姓起了绝好的作用。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热爱子弟兵，部队的发展，抗战的胜利，是难以想象的。

120师后勤机关的自身建设

为了完成120师的后勤保障任务，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党非常重视加强120师后勤机关的自身建设，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

措施之一，建立健全供给工作制度。制度有：

预算制。规定师、旅、团供给机关，每月要编造月预算，作出预算表和写出预算书上报。

计算制。要求填造统计式的平行计算表、收支对照表、单据粘存簿等4项手续，分月份按级上报，并编造复式计算书。原则决定，上月开支经费，下月10号前团报到旅；15号前旅报到师。计算编定后，必须由同级首长审查盖章。

收支制。规定收入项有经费、代收款、寄存款、杂收4项。经过供给机关的一切收入，均按情给予临时或正式收据或乐捐证。支出项目的费用科目，支付范围，开支准则，均要按规定办事。

会计制。1938年5、6月间，彻底转变了会计制度，提高了会计职权，加大了会计范围，严密了会计手续。在出纳管钱不管帐，会计管帐不管钱的原则下面，确定了互相推动、互相帮助、互相监督的基本方针、方式和方法。一切收支均由会计科登记帐目，填发传票，出纳科根据传票收付现金，同时建立经常的报告，出纳科填库存表，会计科填日记表，互相对帐并分送给处部和司令部存查。

审查制。1938年5月，公布了审查委员会暂行工作条例。师、旅、团各级建立了审查委员会，审查各级范围内的一切收支帐目。经济收支情况最复杂的是各个支队，各个支队的帐

目均由师供给处派员检查。

各种簿记。会计科原来只使用出纳日记、总帐、支出分类工作簿记，以后增设暂记日记和来往总帐两项。前者登记全师整个报销经费，后者则记一切暂记款项。出纳科除有现金日记、现金类别帐外，增设了货币换算帐、临时挂借帐及库存表。军实科收发被服使用了服装日记帐、分户帐、分类帐。粮秣科、军械科也分别使用了上述的有关项目。发给连队的有伙食马干、旬报表、津贴花名册、领证、予支证。

上述制度，师供给处执行的比较好，有的旅团由于担负作战任务，远离师部等原因，以后才逐步建立。

措施之二，加强对后勤工作人员的管理教育。师供给处的一般工作人员，由政治部组织甲乙两组定期上政治课，此外，还上军事课。技术人员（工人）每星期日上政治课，有时与生产会议相结合。还运用两天一次的汇报，检查和讨论各部门在两天内的工作，并指出某种工作的优缺点及个人的倾向。经常请求各个同级首长与政治部（处）主任检查与督促供字训令、通令的执行情况，加强供给人员思想意识的锻炼与修养。同时，特别重视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1937年12月，开办了第1期供给人员训练班。有26名学员，学期半年，1938年5月30日结业。学习的主要课程是簿记学、经理学、珠算、政治课。毕业成绩最高平均分为98.25，最低分为58，总平均78.3，有24人分配了工作，开除1个，不及格1个。

措施之三，不断开展反对贪污浪费的斗争。抗战初期，在收支中发生的贪污浪费现象还是比较多的。如警6团供给处正副处长贪污私营买卖。方山兵站站长隐瞒公款，藉口被劫，蒙蔽上级。有的做归队工作的同志受贿赂，不让逃兵归队。还有的拿粮食换菜吃，人数以少报多，在交际中乱花钱等。为了保持供给人员和各级机关的清正廉洁，从上至下，经常进行反对贪污浪费的教育，发现问题，立即查处。对情节严重者，按惩办贪污条例给予各种组织处分。如对警6团供给处正副处长实行了监禁赔偿，枪决了方山兵站站长。

由于120师后勤机关的自身建设搞得比较好，在抗战发展，部队日见扩大，环境日趋复杂的情况下，经受住了考验，完成了自己的职责。

（作者是总后勤部原副部长、顾问，本文由孔令华整理）

在延安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

孙金科

（一）精心筹备大会

1941年9月29日，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东方各民族的代表，在延安桃林公园，举行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筹备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先由筹备会的宣传部长宣读、解释了发起、召集本大会的宣言，经讨论后通过。接着，由组织部长报告工作计划，经讨论，决定了有关事项：代表大会定于10月下旬举行；东方18个民族，各选派代表5名，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妇女联合会、记者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商会、文艺界抗日救国会、华侨救国会等团体，各选派代表1名，华北朝鲜青年学校、朝鲜青年联合会、中国台湾先锋队各派代表1